



马克思主义 与儒学

主编 崔龙水 马振铎
当代中国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崔龙水 马振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崔龙水, 马振锋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12

ISBN 7-80092-259-6

I. 马… II. ①崔…②马… III. 儒家-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0996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203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2-259-6/B·7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3.60 元

DE 99/07

1

前 言

1995年12月4—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在中国孔子基金会迁址前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在京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来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和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50余位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大家围绕着“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如何总结‘五四’以来批判儒学的经验教训”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个题目，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和对话。与会学者、专家一致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值得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儒学则是长达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至今还对中国社会和人们有着一定的影响。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中国儒学，不仅对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精神文明，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本书是从与会学者撰写的论文中选出的，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以至很对立的观点，一方面以综合反映来作为对这次会议的总结，一方面发表出来以引起更多的学者、专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所以结集者对即使是认为很错误的观点也未加评判。现在更需要的是探讨。相信将在不断的探讨中逐渐认同、一致，真正达到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瑰宝，儒学过去曾经、现在和将来还要对世界产生巨大作用。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的文化是无愧于世界的！

本书由崔龙水、马振铎负责统编，乔清举、张进勇、吴可参加了编辑工作。

目 录

前言	(1)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几点看法	张岱年 (1)
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朱伯崑 (3)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夷夏之辨”	李存山 (5)
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思考	吴 为 (1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理论思考	葛荣晋 (23)
传统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齐振海 (39)
用马克思主义看传统与儒学	吕绍纲 (47)
合则两利，离则两伤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	
思考	刘宏章 (55)
解剖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石 训 (71)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	田广清 (81)
辩证法与文化发展战略	
——重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杨 深 (88)
浅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	
——以毛泽东思想为例	刘庆华 (98)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	许全兴 (110)
“五四”以来对待儒学的几个不同阶段	杨翰卿 (124)
谈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	傅云龙 (133)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主体价值问题	叶 舟 (142)
我对五四时期批判儒学的一点认识	肖万源 (157)
关于“儒学复兴”之我见	
——兼谈儒学的当代意义	曹晨辉 (168)
对一种儒学现代发微法的质疑	罗 卜 (176)
对中国传统道德再考察	吴 可 (181)
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冲突、契合	赵春福 (191)
论孔子仁学道德观的普遍性	
——兼谈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的思想	
.....	田玉荣 (200)
继承中国传统美德，构建新时期的道德规范	黎 锐 (213)
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	
——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之比较	范广伟 (226)
对“实事求是”的历史考察	崔龙水 (239)
附录：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述要	乔清举 (25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 儒学关系的几点看法

张岱年

这次研讨会，题目出得很好。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直到五四运动，儒学一直占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究竟应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认为，儒家定为一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儒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未来新儒家不可能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可以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存在。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当然，对于究竟什么是优秀的传统，大家意见也可能不一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民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有基础的。历史上中国有唯物辩证法的传统，因而接受起来并不困难。中国也有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因而可以接受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不优秀的传统，需要加以批判和铲除。“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是惟一的，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说“天人合一”是混沌，是错误的。“天人合一”是在区别的基础上又讲合一。二程讲天道人道合一不正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过多次人与自然、精神与自然的合一。生态平衡问题也不是受中国的影响提出来的。当前我们要注重和谐，提倡“和为贵”，团结、互助、合作，提倡

“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和”的思想非常深刻，“和”是在不同基础上的统一，不是简单的相同。团结——批评——团结，就有和的意思在内。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充满了斗争，“窝里斗”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克服矛盾，注重和谐。关于未来文化建设，有两句话，一是“胸有成竹”，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要确定；二是“目无全牛”，即对中西文化都不要看作一个整体，而应加以具体分析。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以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朱伯崑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出发点，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是个前提。所谓“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都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但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忽略了被接受国的传统，也难以被接受。

关于儒学。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学的影响比较大。研究传统文化不能抛开儒学。但是，儒学自身是个历史的范畴。这个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笼统地谈。“天人合一”有各种流派，天是什么？怎么“合”？都不能笼统地批判或赞扬。儒学究竟有没有生命力？所谓生命力，是指符合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需要。不合乎时代的需要，就成为展览品了。要有生命力，还必须创新。儒学自身的发展也是不断地更新的，搬出老一套东西，是不会得到接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不能赞成。如何创新？要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结合现代科技的成果。所谓丰富和发展，是用新的内容进行补充，不是简单地论证。对儒学本身也要加以改造。精华、糟粕的判别应以是否合乎时代的需要为准。

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永恒的思想，不全是时代性和阶级性。大思想家都有一些永恒性的思想内容，比如《管子》的管理哲学。中国的管理思想首先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像西方那样重

视的是物的管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超出时代的。西方近来也有一些管理学派，开始重视人的问题了。农业社会里产生的思想，并非只对农业社会有效。其中包含的启发和滋味，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如果追求社会的和谐，孔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前人的有价值的思想是智慧，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抛弃传统文化。二者如何结合，我认为要靠搞文化、搞哲学的人的智慧，不在原则方面。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文革”期间编写中国哲学史把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注脚，搞成语录体，结果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教训应该汲取。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与 儒学的“夷夏之辨”

李存山

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持“夷夏之辨”的观点，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澄清，就根本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先后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和现代所奉持的指导思想。儒学产生于先秦，在汉代上升为国家的和民族的指导思想（“国家的”与“民族的”当有区别，但我想，能成为“国家的”必有其民族的一定基础，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当然，如果失去了其民族的基础，现实的就将成为不合理的）。魏晋以后虽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但由宋至清，儒学或新儒学仍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的危亡和文化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逐渐深入人心，并且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华相结合，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1949年后指导中华民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

儒学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是适应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况而使自身的理论形态不断演变的。先秦儒学的最高成就是确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价值观，而在实现国家

的统一和经济、政治的变革等方面存在着“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陷。儒学在汉代之所以能取得“独尊”的地位，是由于汉儒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由魏晋至隋唐，“儒门淡薄”，反映了儒学理论体系比较粗糙而不够精微的缺陷。宋代新儒学排斥释、老，复兴儒学，实也大量吸收了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由秦到清，中国历史治乱更迭，尤其是宋亡于元，明亡于清，暴露了由法家所建立而被儒家所认可（或儒家欲变革而终未取得成就）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土地私有制存在着的严重缺陷，宋明道学的理论形态也有重心性而轻实务的缺陷。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反思和批判，说明儒学在当时正面临着自汉以来所未有的一种转型，但清代的文化专制使这一转型没有完成。鸦片战争以后，如同战国时六国未能抵御强秦的坚甲利兵，中国文化也不能抵御西方列国的船坚炮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实现现代化；而欲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实行改革和转型。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儒学自身的缺陷，儒学没有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有其历史的和文化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有着契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也与儒学的人文价值有着契合的关系。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又不间断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过程。走西方的道路，一是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没有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等等，没有被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所认同。马克思主义不是像佛教、基督教那样由传教士传到中国来的，也不是先由下层民众逐渐传播开来的，而是由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

现民族复兴和文化转型而自己选择的。李大钊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要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东西方优秀文化创造性综合的一个中介，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我认为，中华民族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初衷，决不能忘记。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文化输入，一次是佛教的输入，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文化的输入。佛教的输入，有老庄、玄学作为其文化土壤，满足了中世纪需要有一定的宗教情绪和宗教生活的社会文化要求。但佛教的出世取向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有矛盾的，这一出世取向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虽曾有繁盛之势，但终被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所遏制。它一方面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禅宗为主要代表的佛教各宗派，另一方面其一部分精华被宋明新儒学所吸收。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夏之辨”而排佛者，而这一排佛终归是揭示儒佛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和佛教过度发展对社会生活的不利影响。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宋明新儒学之排佛，一是讲公私之辨即价值观的冲突，二是讲“本天”与“本心”之别即哲学本体论的冲突，而不提或很少提“夷夏之辨”。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风云际会中，也有以“夷夏之辨”而拒斥西学者。但历史昭示人们：中西文化际会不仅是中西之争，而且是古今之争；拒斥西学不仅是思想文化上的保守或门户之见，而且其拒斥的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前程。“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精华相结合，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由于它指导中华民族完成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除台湾省外）的任务，遂在1949年后成为国家的和民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发展，如何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相结合并且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些都是文化发展和创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有成功和正确之处，也有失误和严重失误之处。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现代阐释，可以引发人们进行反思并且吸取其教益。然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也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以“本心”拒斥“唯物”，二是以“夷夏之辨”排斥马克思主义。就前一点而言，“本心”之说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的思维方式；就后一点而言，“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落后的、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两点是相互矛盾的，“吾儒本天，释氏本心”，既吸取外来佛教的思维方式，又以“夷夏之辨”排斥马克思主义，岂能说不矛盾？

“吾儒本天”，用现代哲学术语说，就是客观实在论。我认为，儒家的入世和道德取向能在中国古代居于主流地位，中国文化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在中世纪走入宗教之一途，是以“吾儒本天”的哲学观念为其理论支持的。程朱之“本天”是本之于“理”，即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合理的、道德的；张载之“本天”是本之于“气”，即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然后再说这个世界是合理的、道德的。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新理学”、“新心学”，而没有“新气学”。“新理学”是本之于程朱理学而综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实在论的思想；“新心学”是本之于佛教唯识论和陆王心学而综合了黑格尔、康德等人的思想。就气学的线索说，张载之后，其气本论被纳入“伊洛渊源”；明中期以后，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和戴震等人的思想可谓“气学的复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有此说），亦可谓“新气学”。在中国近代，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中也有气学的因素。在中国现代，何独没有“新气学”？我认为，从

一定意义上说，气学在现代已不能新，若新就只能是现代物理学或人体科学等等；从另一意义上说，气学在现代也能新，若新就只能“新唯物论”。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推崇“（横）渠（船）山”之学、颜李之学，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这两方面无疑是相互贯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也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气论或气学讲的，亦可谓是“新气学”，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流衍、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本心”与“唯物”之争，可谓张载与佛教之争，罗钦顺、王夫之与陆王之争的一种现代形态，而不可以“夷夏之辨”简单、武断地对待之。

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应该是实事求是地对儒学进行分析，继承和发展儒学在现代仍有价值的合理因素。儒学的核心思想即其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内容，如入世的价值取向，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人本或民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经世济民、重视民生日用的价值取向，强调君子自强和民族自强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无疑是需要肯定和继承发扬的内容。应该说，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不肯定这些方面，就是自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即唯物史观具有儒学所不具有或与儒学的道德绝对主义相冲突的内容。我认为，中国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哲学内容，就是唯物史观把儒家的绝对的道德本体转变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上层建筑（应该指出，所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非如一幢幢的楼房那样是分离断裂的，而是社会发展长河中的“连续统”）。道德是社会生活需要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不断积淀，社会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因而首先也具有继承性和弃旧开新的创造性。儒家之“礼”继承了周代之“礼”，然

而周代之“礼”是强调“礼别异”、“礼明分”，儒家之“礼”则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一种创造；儒家之“德”继承了周代之“德”，然而周代之“德”是畏天之威、祈天永命而“敬德保民”，是礼乐的行为规范和仪典形式，儒家之“德”则强调“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更是一种创造。儒家把其继承和创造的“仁”、“礼”道德（汉代以后主要是“三纲”、“五常”）逐渐发展为社会的本体和宇宙的本体（宋明道学是如此），这在中国古代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人际关系曾经起了积极作用，但其泛道德论的理论形态不利于科技和经济等因素的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儒学的道德之“体”如果不改变，不还原为社会之“用”，那么在这一“体”的笼罩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根本无从可能（“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昭示了这一点）。在西方文化的诸种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明确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是儒学的道德之“体”转变为社会之“用”的转型；只有这样，原来在儒学的道德之“体”笼罩下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因素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变革，我们也才能够去分析儒家的道德中哪些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哪些是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仅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就是无可取代的。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发展于中国；同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也必将发展于中国。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家研究，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进行双向反思和互动的问题。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做出使其更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有利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结合的调整。而且，这种指导应该是出于理论的自觉、自愿而又有百家争鸣的指导。对以其他方法研究儒学，也应